

阐释学视野下的
《楚辞补注》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昌论丛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刘洪波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阐释学视野下的《楚辞补注》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昌论丛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刘洪波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阐释学视野下的《楚辞补注》研究 / 刘洪波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 - 7 - 5161 - 9140 - 8

I. ①阐… II. ①刘… III. ①古典诗歌 - 诗集 - 中国 - 战国时代
②楚辞 - 注释 IV. ①I2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253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
插 页 2
字 数 274 千字
定 价 7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东北师范大学青年学者出版基金资助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序 言

《楚辞》，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也是学界的显学之一。无论当前与今后研究的走向如何，都要直面屈原的作品及其产生的背景，这是研究的基点。屈原名平，字原，屈是春秋初期其祖先的封地。屈原约生于楚威王元年（前339），死于楚襄王二十一年（前278）。楚怀王五十六年，楚、秦之间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大战是在次年（前312）进行的，这一年的战争分春秋两次进行。春天的战争，是在丹淅，楚国惨败，死者八万，将领七十余人被俘，汉中郡被占领。楚怀王大怒，又发兵战于蓝田，又大败，这是秋天进行的。在蓝田大战之前楚怀王要遍祀天地、山川、鬼神以求福佑，命屈原作祭神歌——《九歌》，这就是《九歌》的来历，也正因为《九歌》与这次重要的战争有关，才得以流传下来。这次大战以后的第十三年，秦昭王诱骗楚怀王会于武关，将其劫持到咸阳，强迫割地，怀王不从，被扣留在秦国，后死于秦。屈原在怀王欲赴武关之时，曾经加以劝阻，作《离骚》以明志。怀王被扣留后，楚国亲秦势力把屈原驱逐出国都，不许参与国事。屈原作《离骚》后，又写了《惜诵》以重申此意，但仍然不能改变处境，便于此年秋天离开郢都，沿长江东行，入汉水，溯汉水北上，最后来到楚国前线——汉北（汉水以北）。在舟行经春秋末年楚故都、楚昭王所迁的都都时，参拜了楚先王宗庙，看到庙中的壁画，有感而作《天问》，这就是《天问》的写作背景。到

汉北后，作《抽思》。秦襄王三年，秦国归还了楚怀王的灵柩，屈原为此作招魂曲——《大招》，以招楚怀王之魂。楚襄王二十一年旧历二月初，秦将白起攻占郢都。屈原在这个时候往江南流浪，因此他在二月初离开郢都，作《哀郢》。后渡江，到湘西，上沅水，入溆浦，作《涉江》。四月间由湖南南部北返至湘阴，临汨罗江，在极度悲愤的心情下投水而死，投水之前作《怀沙》，这是他的绝命词。

先秦的古籍，遭秦火而散亡。屈原的作品重见于世，是经过汉初人的努力搜求而再获出现的。我们今天读到的最早《楚辞》本子，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王逸于《楚辞章句》中标明“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说明王逸作《楚辞章句》是以刘向所集《楚辞》为底本的。后来《四库全书提要》谓“褒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初向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遊》《卜居》《渔父》，宋玉《九辩》《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及向所作《九叹》，共楚辞十六篇，是为总集之祖”。从现存资料来看，楚辞的收集与整理，在汉初就开始了。近年在安徽阜阳发掘了汉汝阴侯夏侯灶的墓葬，其中有一部楚辞书的残简，一为《离骚》残句，二为《涉江》残句。夏侯灶是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卒于汉文帝十五年，以此知楚辞的成书是较早的。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离骚后序》中说“屈原辞凡二十五篇……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十六卷中包括屈原辞七卷二十五篇，另外的九卷即《四库全书提要》所谓宋玉等人的作品，王逸在为上述作品作章句的同时，又加进了自己所作的一篇《九思》，于是全书就成为今传的十七卷本。

王逸的《楚辞章句》传到宋代，有洪兴祖为之《补注》，“《楚辞补注》先列王逸原注，而后补注于下。一般都逐条疏通，特别对名物训诂作详尽的考证和诠释。对旧注常有驳正，并广征博引，因而保存了他那时见到可后世已经失传的从汉代到宋朝的一些相关说解资料”（白化文、李鼎霞：《楚辞补注·重印出版说明》，中华书局1983年

版),按后出转精的规律,后代洪氏之书通行而王逸之书废,故而从专书研究的层面,对《楚辞补注》展开探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刘洪波博士的《阐释学视野下的〈楚辞补注〉研究》一书,就是在上述的学术氛围下开展的研究。该书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清楚地疏解了洪兴祖“补注”的阐释体例,指出“补注”重“补”的特点,归纳出“补注”正文下有王逸注者又有洪氏所补者13种,正文下无王注但有洪补者5种,正文下无王注亦无洪补者3种。对于洪氏《补注》中后来体式窜乱的问题进行辨析,考证了体式窜乱时间、《考异》散附《补注》问题、《释文》散附“补曰”问题、五臣注与李善注问题。第二,作者较系统地论证了洪氏阐释《楚辞》的历史性。梳理了洪氏的治学思想、趋于多元化的哲学思想、屈骚评论的文学倾向等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三,作者从对经典文本地位的不同态度、对文本阐释方法的不同选择、对文本阐释尺度的不同把握、对文本阐释理据的不同依托四个层面,比较分析了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三家的异同,总结出王逸尊《骚》为经,依经立义,重视训诂,朱熹重视义理,偏离文本,以义裁之;洪氏倾向兼重,尊中有破,疏可破注的特点。分析了王逸《楚辞章句》阐释不足、朱熹《楚辞集注》阐释过度、洪氏《楚辞补注》阐释适度的一些内在问题,突出了《楚辞补注》的学术价值。因此,这部《阐释学视野下的〈楚辞补注〉研究》书稿,是刘洪波博士在“楚辞学”研究领域中从阐释学的角度对《楚辞补注》进行探讨的结晶之作,意义自不必待言,期望她将来更有大作问世。

傅亚庶

丙申仲夏之月于东北师范大学

“文昌论丛”序言

论丛以“文昌”为名，有以说也。

其一，文昌路是目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学院的坐落之所。2009年，应学校整体规划的调整要求，文学院奉命从据守二十年（1988—2009）的“红楼”搬迁至文昌路这座小院的三栋旧楼。学院里年长一点的先生们都记得，这里本是中文系的旧地，中文系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候就是这里缔造的。故以“文昌”为名，为了纪念文学学院的沧桑历史，纪念曾在这里创造不息、为我们留下宝贵遗产的前贤们。

其二，常有同仁说文昌路是文学学院的“福地”。此番搬迁，当时只道是“暂厝”，不意倏忽又六年。纵观文学院的历史，重回文昌路这个时期，学院在全院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学科发展走上了复兴。而“文丛”中的作者，多数是这个时期入职学院的。从学校规划来看，文学院迟早要离开文昌路。取“文昌”之名，也有意铭记这个时期里新老学人团结进取、急起直追的历程。

其三，从字面意义上，“文昌”寄寓着文化昌明、文学昌盛、文章昌茂、文运昌隆等意涵，故以“文昌”命名丛书，代表我们对文学院、对东北师范大学、对中华文明的祈愿。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前身，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建立的第一所高校——东北大学的国文系，从1946年至今，她已走过了70年。70年中，历代学人在这片沃土上耕耘奋斗，把文学院建成了人文学术与

教育的关外重镇，在国内有着较高的影响力。

十年前，在建院（系）六十周年之际，学院组织出版了《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语言文学论集（1946—2005）》，这部煌煌一百四十万言的大书，为院史上最重要的成果进行了文献总结。去年，王确教授开始主持编选“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史文库”，把学院历代学人的学术代表作重新编订，统一装帧出版，首批出版著作十种近三百万字，这些都展示了这座古老学院的丰腴成就。近年来，文学院有了许多新的气象和变化，“文昌论丛”必然是这一页历史的见证之一。这套书首批推出八部著作，与历史巡礼式的文献编纂和学术史文库式的代表作展示的思路不同，“文昌论丛”着力助推新生代学者。丛书的诸位作者，年龄最大的四十岁，最小的三十二岁，半数以上属于“80后”学人，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最近三年才加盟文学院，他们的才思与文笔代表着文学院的未来。近年来，文学院形成了一种共识：前贤们深厚的积淀是我们事业发展的土壤，但未来的持续发展，要依靠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这个共识正在逐渐升华为一种“尚少”的文化：无论从观念上，还是从管理上（比如科研奖励向青年教师“倒挂”的激励机制），学院都有意向年轻人倾斜，以期更快更好地促进青年教师成长，以承担起文学院的未来。这一文化已在文学院近年的发展实践中产生了积极效应，在校内外产生了良好反响。当然，我们知道，若没有文学院这些前辈和中年学者们的理解与支持，就不可能培育和形成这种文化。“文昌论丛”的推出，既受惠于这一文化，反过来也验证这一文化，并丰富它的内涵、为它积累经验。集中推出三十多岁青年教师的著作，这在东师文学院历史上还是首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希望这套论丛能兼具“导夫先路”的作用：随着目前新生代的持续成长，以及未来新生力量的不断融入，论丛会不断增加品种、扩大规模，最终形成我们的学术品牌。

“文昌论丛”是文学院青年一代学人的检阅。从作者的学缘结构来说，他们分别在法国戴高乐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取得博士学位，

这反映了学院目前的师资学缘构成更趋向于多元化，人才结构上的新变及其背后蕴含的开放和包容精神，必定对文学院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从学科角度看，“论丛”涵盖古典文献、语言学、古典文学、近现代文学和文艺美学，基本囊括了文学院的主干学科。从研究水准来说，由于多数是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形成的专著，经过了严格遴选，并非一般性概论或入门式作品，所以都聚焦学科的前沿问题，形成许多独具个性的观点。

东北师范大学社科处为丛书的出版提供了有力支持，学科建设办公室提出了指导建议，王确、刘雨两位教授对丛书的出版非常关心，徐强、陶国立为丛书的策划出版做了许多实际的工作，这套丛书在不同出版社统一装帧出版，各家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对丛书给予了极大的理解和支持，在此一同表示谢意。

必须指出，丛书中的多数著作是作者的第一部书。起步之作，难免稚嫩，深愿学界高明之士能够有以教诲。你们对这些著作及作者的批评与指教，就是对东师文学院的莫大支持。我在东师文学院求学七年，回国后又在这里工作七年，人生中许多重要经历都与这里难解难分，我从中受益良多，也承担了师友们的许多期待，实乃人生中之幸运。借此机会我想向这座学院和老师们表达由衷的敬意，也想以“戒骄戒躁”四字，与各位青年学者共勉。生有涯，学无涯，学问之路正长，这只是一个起点，我们还要日进、日进、日日进，方能不负时代，不负前贤。

李洋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日

摘 要

阐释学是一门对意义的理解和阐释的理论，它既是一种哲学，也是一种方法。鉴于“准确的经典注疏可以拿来当作解释的一种特殊的具体化”^①，对经典注疏纳入阐释学的视角成为可能的和必要的。从《楚辞》的文本阐释来看，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是代表性的《楚辞》阐释性文献。因此，本书主要以中华书局2002年印刷的1983年版白化文等人的点校本《楚辞补注》为依据，在传统文献学的基础上，拓宽研究思路，从阐释学的角度对洪兴祖的《楚辞补注》进行研究，本书主要分为五章。

第一章的内容是洪兴祖阐释《楚辞》的动因。就文本阐释而言，任何阐释都依赖于阐释者的“先入之见”，这其中就包括阐释者个体的阐释动因。就洪兴祖阐释《楚辞》而言，他少时即得《楚辞》一书，浸润此书数十年，绝非偶然。探寻他阐释《楚辞》的动因，有四个方面：企慕屈原，欲优入圣域；感于时政，借古以讽今；壮志难伸，寄悲愤之情；不满旧注，补前贤不足。正因洪兴祖企慕屈原，才对以往“褒贬任声”的评价加以评析，并把屈原当作自己人格修炼和履行实践的目标，体现出“企贤入圣”之意，并将其内化于心，

^① [德]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84页。

外化于行。且他耳濡目染了宋代的诸多乱象，受时代情势的激励，借补注《楚辞》阐发屈原来感发时人斗志。他还有感于自身与屈原相似的遭际，发愤以抒情，于作品中寄寓自己的悲愤之情。并鉴于王逸《楚辞章句》在流传过程中的疏漏与致误，才撰写了《楚辞补注》。

第二章的内容是洪兴祖“补注”的阐释体式。洪兴祖所作《楚辞补注》是现存最早的以“补注”形式出现的古籍阐释文献，“补注”一体的创设在阐释体式中属于发凡起例。洪兴祖创建并选定“补注”体式来阐释《楚辞》，绝非偶然，而是针对《楚辞》及《楚辞章句》的性质和特征，依据自己“补不足，发己意”的解释目的，凭借着解释学的传统，在“笺”体启示下创制和选择的结果。而分析他在阐释《楚辞》时列《释文》篇次、列逸注于前、增加序与注、附《考异》《释文》等具体的体例安排，及其今所见的散附后的具体训解补释体例，都可以发现“补注”重“补”的取向。

第三章的内容是洪氏《楚辞》阐释的“历史性”。任何阐释者都是带着其自身历史情境中的“历史性”来进行文本阐释的。洪兴祖的《楚辞》阐释也是蕴含着他个人思想倾向的创造性行为。此章主要通过对《楚辞补注》的文本分析，结合洪兴祖所处的历史情境，挖掘他在《楚辞》阐释中体现出的主体意识，管窥他以校讎为本的治学思想、趋多元化的哲学思想及其屈骚评论时的文学倾向。具体而言，发现他一生著述中，多部涉及校勘，且校勘时，广搜众本，态度极为严谨认真。且其哲学思想呈现多元化，以儒为主，涉及道家，受理学影响，也有对其他思想的接受，可谓兼收并蓄。而分析他阐释《楚辞》的具体文字，可以发现他对传统的楚辞比兴观多有突破，对楚辞的文体特征有一定认识，且在对《楚辞》中的神话进行阐释时，力图还原一些神话传说的历史原貌，其文艺思想虽仍隶属儒家，但体现出了屈骚评论的文学视角。

第四章的内容是《楚辞》三家注的阐释对比。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补注》与朱熹《楚辞集注》是《楚辞》阐释史上最重要的三个《楚辞》阐释文献，他们在阐释《楚辞》时，在文本

态度、阐释方法、阐释尺度、阐释理据等方面都所有不同。其中王逸《楚辞章句》“依经立义”、重视考据、征引理据以经书为主，存在着汉学的阐释不足；朱熹《楚辞集注》则“以义裁之”、重视义理、依托的材料以经子为主，存在着宋学的阐释过度。而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既有对文本地位的尊重又有所突破，既重视训诂又兼及义理，在援引文献时广引四部，态度开明，洪兴祖的这种《楚辞》阐释，既未忽略文本客体对阐释行为的制约，又能适当融入自身的主体性，主客观融合使他对《楚辞》的阐释更为适中更为适度。

第五章的内容是屈洪同轨，视域相互融合。此章首先对屈原从“边缘情境”的视角加以解读，介绍了“边缘情境”及其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言明楚国的屈原因时代环境和个人际遇而遭受到现实困境，其困境带有强烈的“边缘情境”意味，而这种“边缘情境”与屈赋的创作和屈原之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然后阐明宋代洪兴祖与屈原有着类似的历史境遇，有着相同的人生轨迹，屈洪两人同轨，境域相融合，因两人境域融合，洪兴祖才对《楚辞》倍加关注并进行了阐发。而且正因为境域之融合，洪兴祖在阐释《楚辞》时，能使阐释者的视域与《楚辞》文本的视域之间达到有效融合，且这种视域融合的“视域融合度”较高，体现出其阐释《楚辞》时的真知灼见。

总体而言，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是再创造性的《楚辞》阐释性文本，洪兴祖在其明确的阐释动机的驱使下，以发凡起例的“补注”体对《楚辞》进行了有意识有目的的阐释，并在具体的阐释当中体现出他个人的“历史性”，他的《楚辞补注》相较于王逸的《楚辞章句》和朱熹的《楚辞集注》，阐释更为适中，且他与屈原的“同轨”使他作为阐释者的视域与《楚辞》文本的视域达到融合时，“视域融合度”较高，使其阐释不失为一种合理和有效的阐释。

目 录

第一章 洪兴祖阐释《楚辞》的动因	(1)
第一节 企慕屈原, 欲优入圣域	(2)
一 企慕屈原, 评析其褒贬	(2)
二 企贤入圣, 内化与践行	(11)
第二节 感于时政, 借古以讽今	(16)
一 宋代局势, 内忧兼外患	(16)
二 有感而发, 借古以讽今	(21)
第三节 壮志难伸, 寄悲愤之情	(27)
一 仕途坎坷, 曾几番起伏	(28)
二 秉持气节, 发愤以抒情	(36)
第四节 不满旧注, 补前贤不足	(42)
一 《楚辞章句》存在的不足	(42)
二 补注一体, 乃力补《章句》	(50)
第二章 洪兴祖“补注”的阐释体式	(57)
第一节 “补注”体式的创制定选	(57)
一 针对阐释对象来选定体式	(58)
二 “补不足、发己意”的阐释目的	(69)
三 阐释学传统下的体式创制	(77)
第二节 “补注”体式的体例安排	(85)

一	列《释文》篇次,明传本异同	(86)
二	列逸注于前,而补充其后	(89)
三	序与注皆增,以扩充内容	(90)
四	附《考异》《释文》,以完善补注	(95)
第三节	“补注”重“补”的体例体现	(97)
一	《补注》体式紊乱的辨析	(97)
二	具体补释体例的体现	(108)
第三章	洪氏《楚辞》阐释的“历史性”	(123)
第一节	注重校雠的治学思想	(124)
一	校雠态度,认真严谨	(124)
二	广搜众本,注重勘校	(129)
三	一生著述,多及校勘	(134)
四	《补注》中校雠的体现	(140)
第二节	趋多元的哲学思想	(147)
一	以儒为主的哲学思想	(148)
二	义理阐发的理学倾向	(157)
三	涉及道家的思想体现	(159)
四	儒道之外的兼收并蓄	(163)
第三节	屈骚评论的文学倾向	(167)
一	“香草美人”的意象比兴	(167)
二	神话阐释的原生色彩	(171)
三	楚辞皆诗的思想传承	(182)
四	隶属儒家的文艺思想	(185)
第四章	《楚辞》三家注的阐释对比	(190)
第一节	经典文本地位的不同态度	(191)
一	王逸尊《骚》为经、“依经立义”	(191)
二	朱熹偏离文本、“以义裁之”	(197)
三	洪氏尊中有破,“疏可破注”	(202)
第二节	文本阐释方法的不同选择	(207)

一 《楚辞章句》重视训诂	(208)
二 《楚辞集注》重视义理	(212)
三 《楚辞补注》倾向兼重	(217)
第三节 文本阐释尺度的不同把握	(225)
一 《楚辞章句》阐释不足	(226)
二 《楚辞集注》阐释过度	(229)
三 《楚辞补注》阐释适度	(232)
第四节 文本阐释理据的不同依托	(240)
一 王逸言必称经, 经书为主	(241)
二 朱熹重理简洁, 经子为主	(245)
三 洪氏征引四部, 态度开明	(252)
第五章 屈洪同轨 视域有效融合	(258)
第一节 “边缘情境”下的屈原解读	(258)
一 “边缘情境”与文学创作	(259)
二 屈原困境与“边缘情境”	(260)
三 屈原之死与“边缘情境”	(263)
第二节 洪兴祖与屈原的境域融合	(266)
一 屈洪同轨, 境域相互融合	(267)
二 境域融合中的《楚辞》阐发	(269)
第三节 “境域之融合”与视域融合	(272)
一 境域融合与视域融合的问题	(272)
二 洪氏阐释时视域的有效融合	(276)
后记	(285)

第一章 洪兴祖阐释《楚辞》的动因

海德格尔说：“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见到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须有这种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了的，这就是说，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了的。”^①也就是说，他认为任何理解和阐释都依赖于理解者和阐释者的“先入之见”。而所谓的“先入之见”是由阐释个体所具有的文化、经验、记忆、动机和情感等因素构成的，并且受其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个体生存状态的影响和制约。

洪兴祖作为《楚辞》文本的阐释者，他对《楚辞》的具体阐释也是建立在他的“先入之见”基础上的。这种“先入之见”就包括他的阐释动因。洪兴祖少时即得《楚辞》一书，浸润此书数十年，最终创作出《楚辞补注》这一宋代具有代表性的《楚辞》阐释文本，绝非偶然，他阐释《楚辞》的动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① [德]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84页。